

# 一九五〇年代初新区基层干部的生成

——以苏南公学为考察对象

黄 骏

**[摘要]**1949年新政权建立前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基层干部匮乏的难题,这在新解放区体现得尤为明显。为化解此问题,中共广为建立了各级干部培训学校,公学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种类型。本文以苏南公学(1949~1953)为考察对象,重点分析了该校学员的来源构成、入学时的心态,校方对其进行思想更新的方式与效果以及学员毕业后的工作去向等方面的内容,从中映射出中共兼顾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组织政策。

**[关键词]**1950年代;新区;苏南;干部;公学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21)04-0084-13

干部对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了快速、规模化地生成干部,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创建了以“延安公学”为标志的干部培训学校系统,从此公学也成为中共培训干部的重要机构之一。1949年后,在新旧政权更迭在即的背景下,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干部培训工作。毛泽东、刘少奇多次将华北地区的一所重要干校华北革命大学的办学报告批转给各中央局,以供他们周知与仿效<sup>①</sup>。

就1950年代初期干部问题研究而言,研究者多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在建政前后面临的基层干部匮乏问题及采取的对应措施,但未多论述干校在其中起到的作用<sup>②</sup>。美国学者李滨(Douglas A. Stiffler)的《创建“新中国第一所新式正规大学”:1949-1950年》是为数不多的论述建国初期干校的专文。该文以当时最重要的干校中国人民大学为研究对象,通过人大所聘苏联专家的视角展开论述。在苏联专家看来,人民大学广为招收各阶层学员的做法与苏联学校强调学员工农出身存在着明显差异,因而对人大招生方式不以为然,他们也对学生思想改造的效果持保留态度<sup>③</sup>。苏联专家的这些看法是否成立,有值得探讨的空间。本文选取苏南公学为考察对象,以江苏省档案馆藏资料为主要史源,探讨了苏南公学的运行机制,从中映射出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组织政策的施为。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10~611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61~462页。

② 何志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新区的干部培养及其群体发展趋向——以川北区为考察对象》,《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0期;曹佐燕:《“胜利负担”:中共对旧政权公务人员处置政策的演变(1949-1952)》,《史林》2017年第2期;饶泰勇、游海华:《新中国成立前后浙江省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3期。

③ 李滨(Douglas A. Stiffler):《创建“新中国第一所新式正规大学”:1949-1950年》,周杰荣(Jeremy Brown)、毕克伟(Paul G. Pickowicz)编:《胜利的困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岁月》,姚昱等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3~323页。

## 一、苏南公学：中共新区基层干部生成的基地

在中国近现代教育体系中，公学曾是一种颇为重要的高校形式，择其著名者有南洋公学、复旦公学、中国公学等。它们的开办与发展都为提升当时的国民教育水准做出了积极贡献。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公学在原有国民教育属性之外，增添了新的内涵。为了将大批奔赴陕北的左翼青年培训成革命干部，中共中央决定开办一所专门学校，拟命名为“延安大学”。动议报送重庆后，国民党以延安已有抗日军政大学为由，不同意再开设一所大学。中共于是决定采以变通方式，将学校名称改为“延安公学”，以绕过对方设置的政治壁垒<sup>①</sup>。从此，“公学”一词在革命话语中也就有了干部培训学校的新意涵。

模仿延安公学样式，各敌后根据地陆续建立起这类塑造学员政治观念与提升业务素质的学校。它们虽办学规模大小不一，可都推动了当地干部队伍的迅速壮大。公学也成为其后十多年中共培训干部的重要方式之一，苏南公学便是1950年代初期华东地区一所规模较大的干校。

苏南公学，简称苏公，前身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华中工作委员会创办的华中公学及华中大学。1949年4~5月，随着国民党统治在苏南地区的瓦解，中共苏南区党委迅速在当地成立了新政权。中共中央华东局为接管上海而筹建直属干校“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为了区别，苏南区党委决定华中大学改用“公学”旧称，加之该校立足于苏南地区办学，于是将学校名称正式确定为“苏南公学”，校址定于区党委所在地无锡市。

由于苏南政权建立之初，起到主导作用的是南下干部。他们中多数人因长期在苏北根据地工作，“只有老解放区的工作经验”，对新区情况暂时缺乏深入了解。本地干部原先多处于地下斗争状态，只了解自己所接触到的那些局部状况，且“缺乏掌握公开政权的经验”<sup>②</sup>。故而在区党委看来，苏南干部的质量有待提高。

苏南干部的数量同样不能让区党委满意。经过建政后约半年的发展，至1949年10月，苏南区仅有29209名干部<sup>③</sup>，而全区人口约为1200万，以总人口约2%的干部，想在短期内完成恢复工农业生产、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平定物价、土地改革等诸多事务，工作难度可想而知。于是干部培训成为区党委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苏公成立后，最重要的使命是为苏南地区快速培训一大批基层干部，以改变苏南干部“软而弱”的现状<sup>④</sup>。

在区党委和行署指示下，苏南公学很快确立了办学目的：首先，快速培训新干部，尤其是具备财经专业知识的干部。苏南公学建立之初，学校曾规划只需学习二个月左右学员便可结业，有些学员甚至不到两个月就要走上工作岗位。首批学员3000余人入校一个月之后，便从中选拔了1200人下农村，参加苏南各地的土改运动。1950年学校走向正规化后，苏公先后成立了银行系与企业财务管理系，重点培训经济建设必需的财经干部。这两个系的学员需要学习政治经济学、簿记核算原理、统计应用经济学、政府预算会计等专业知识，学习时间也相应地延长到二年左右。

① 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页。

② 陈光：《陈部长在第一次直属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上的报告》（1949年6月6日），江苏档案馆藏，档案号：（以下简称苏档）7006-001-0054，第2页。

③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448页。

④ 中共苏南区党委：《区党委关于大量训练、提拔干部、学生、技术干部的指示》（1949年6月），苏档7006-001-0008，第30页。

不过,学员因仅学习与未来工作直接相关的专业知识,所以在校学习时间仍少于普通高校的经济专业学生。

其次,审核留用人员的个人历史。为了顺利接管城市与稳定社会秩序,中共针对前政权的工作人员制定了“包下来”的政策,允诺新政权建立后,将继续留用他们。而旧人员也确有自身所长。他们长期从事某项工作,对地方情况和业务较为熟悉,这一点可弥补南下干部与原地下党干部工作经验不足的弱点,有利于当地的秩序重建。因此,苏南各机关留用了大批旧政权的工作人员。以无锡市为例,全市有1029名干部,旧人员占比为32.55%<sup>①</sup>。但苏南地区作为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带之一,政情异常复杂,不少留用人员1949年之前“曾一度失足,参加了反动党派、团体、军队和特务组织,甚至严重的危害过人民的利益也有”<sup>②</sup>,其中藏有敌特的可能性亦不能完全排除。为减少或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留用人员需接受深入的个人历史调查。他们被送至苏公学习后,学校将结合他们的个人履历与学习期间的表现进行一番综合考察后,发现其中是否存有可疑分子。而且,一些留用人员“有浓厚的旧意识”,难以适应新政权雷厉风行的施政风格,所以他们也是更新思想的重点对象。如1950年10月镇反运动开始后,有些留用人员对镇反意义认识不足,区委领导认为必须改变他们原有观念,于是指示各单位将这些人员送到苏公去接受思想改造。

最后,缓解就业压力。1949年新政权建立前持续不断的战乱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不少学子虽有心向学却不得不中断学业,谋求一份职业养家糊口。因经济败坏而失业在家者更是比比皆是。考虑到不少失学失业人员具有中、小学文化程度,区党委决定从中招录一批人员进入苏公学习,这样既能达到培训新干部的目的,也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苏公为此在无锡、苏州、镇江、常州、松江五地进行考试。考生只须为财政、金融与保险行业失业人员、具备高中毕业生或同等学力之失学知识青年便可报考<sup>③</sup>。

单位编余人员是另一类基于就业考量而进入苏公学习的群体。1949年8月,区党委认为很多机关臃肿庞杂,勤杂人员太多,不利于减轻财政困难,需要精简部分人员,于是安排他们先去学校学习一段时间以作为就业前的缓冲,待出现新的工作岗位后,再行分配。部分军队转业干部,也依循这种方式进入了苏公学习。

## 二、学员的来源及其入校心态

从1949年无锡建校至1953年迁址扬州改组为江苏省行政干部学校,苏南公学历时三年多时间,其主体办学时期是从1949年6月至1952年10月。在这40个月内,它共开办了6期,招收学员12741名<sup>④</sup>。招收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招生考试。行署作出公学招生决定后,在《苏南日报》上登载招考简章<sup>⑤</sup>,通过考试录取者主要为失学、失业人员及原先被遣散的旧政权人员。他们大多具有中学文化水平,在当时教育普及程度有限的背景下,已被视作知识分子而进入银行、企业管理专业学习。学校培训了7520名此类学员,占学员总数的59%<sup>⑥</sup>。另一种为机关调送,计5221

① 中共苏南区党委:《干部配备情况》(1949年8月),苏档7006-001-0072,第41页。

② 苏南公学辅导科:《第一期辅导工作总结》(1949年8月),苏档7015-001-0001,第30页。

③ 吴天石、王韦平:《苏南公学银行系招生简章》(具体日期不明),苏档7015-002-0044,第14页。

④ 苏南公学:《三年来教学工作概况》(1952年10月18日),苏档7014-001-0047,第11页。

⑤ 苏南公学:《一九五二年群众来信处理情况的报告》(1952年),苏档7015-002-0044,第113页。

⑥ 苏南公学:《三年来教学工作概况》(1952年10月18日),苏档7014-001-0047,第11页。



人。这些学员又可细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送来更新思想的人员，有2262人，以行署商业处送来调训的在职干部最为典型。学校将对他们进行系统的革命理论教育，以重塑其思想观念。第二类是编余干部，有2385人。他们多因单位精简编制而被送至苏公。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学员是因为自身的特殊情况而被送来学习。以1952年为例，有319名从革命老区到苏南的工农干部、荣誉军人和年龄较大的勤杂人员入校学习，其中约1/3为文盲和半文盲。以他们的年龄和身份，若去中、小学补习文化知识显然不宜，唯有苏公才是合适的选择<sup>①</sup>。更为特殊的是159名来自南京市的编余干部。他们当中，“受行政处分的39人，刑事处分的2人，在政治历史上有问题的74人，内一般反动党团员16人，反动党团骨干分子58人”，因而此类学员被认为“政治品质较差，政治历史情况也较复杂”。单位安排他们去苏公，希望学校不仅要更新他们的思想，还要“结合进行组织审查，以达到弄清其政治历史之目的”<sup>②</sup>。第三类是在镇反和司法改造运动中被单位更换的旧人员，计有574人<sup>③</sup>。以司法人员为例，他们原在苏南各级法院工作。1952年三反运动进入司法改造阶段后，这些司法人员被所在单位领导认为犯有较严重的错误或是“旧司法观点”很深，不宜再承担司法工作，于是被调至苏公接受集训<sup>④</sup>。

苏公学员数量众多，入校心态自然不会整齐划一。据校方调查，有些学员是为了提高文化水平而来校学习，也有些学员就是想给自己“镀金”。不少报考银行系的人员还有着“浓厚的个人打算和雇佣观点”。对他们而言，银行工作是“金饭碗”“铁饭碗”，期盼通过在苏公的学习将自己身份转为银行干部，以改善生活处境<sup>⑤</sup>。

与主动报考人员相似，单位调训人员的心态也颇为复杂。来自行署商业处的学员不少人虽有干部身份，但具体职务多系营业员、保管员、财务出纳等。他们认为自己工作地位低，“吃不开”，“干部不像干部”<sup>⑥</sup>，进入苏公后，依旧情绪不佳。有人希望借机调动工作或入校后一心钻研数学，准备日后考大学。也有人听到要“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进行思想改造”便产生了抵触情绪，表示自己对学习理论没意见，可“改造”总觉得“不光荣”，因为只有贪污分子及在工作中犯错误的人才会被“改造”。更有些学员在三反运动期间是单位的“打虎队员”，可在苏公看到当时被作为“老虎”的人也来学习，偏偏还与自己编入同一组，不免心态失衡，认为自己受到了莫大委屈<sup>⑦</sup>。

那些有着个人政治历史问题的学员对自己入校学习既愤愤不平，又忐忑不安。他们一方面认为“原机关内比我历史复杂的同志多呢，为什么他们不来？”另一方面又担心搞清了个人历史后，自己会不会受到处理。在这种心态影响下，有人不免牢骚满腹地埋怨道，“新中国前途光芒万丈，个人前途暗淡无光”<sup>⑧</sup>。

更引起校方重视的是，无论通过何种方式入校的学员，都存在着“非无产阶级”看法，这主要表现在：

(1) 对中国共产党缺乏基本认识。这一点在首批学员那里体现得最为明显。1949年苏南新

① 苏南公学：《一九五二年教学工作概况》（1953年1月），苏档7014-001-0047，第8页。

② 苏南公学：《一九五二年教学工作概况》（1953年1月），苏档7014-001-0047，第8页。

③ 苏南公学：《三年来教学工作概况》（1952年10月18日），苏档7014-001-0047，第11页。

④ 苏南公学：《第三班旧司法人员集训工作总结报告》（1952年11月6日），苏档7014-001-0047，第35页。

⑤ 苏南公学校长办公室秘书科：《银行系编写材料提纲》（具体日期不明），苏档7015-003-0030，第49页。

⑥ 苏南公学第一部：《工作总结报告》（具体日期不明），苏档7015-002-0045，第2页。

⑦ 苏南公学第一部：《工作总结报告》（具体日期不明），苏档7015-002-0045，第3页。

⑧ 苏南公学：《苏南各机关镇反学习后送来学习人员的情况报告》（1951年），苏档7015-002-0025，第2页；《苏南公学政治班、一、二、三、八班政治思想教学总结（初稿）》（1952年），苏档7014-001-0047，第18页。

政权刚建立后不久，他们便入校就读。绝大多数学员此时对中共和解放军只闻其名而未闻其详，更谈不上有多少切身体会，所以常袭用国民党统治下的生活经验来看待新生事物。有些人不了解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性质，便望文生义地认为它与三青团一样，进而臆断青年团也会像三青团那样“强迫入团”，不由得产生了畏惧心理<sup>①</sup>。

(2)以“正统观”看待国民党政权。绝大多数学员都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完成的中小学教育，所以他们中有些人不可避免地受到国民党党化教育的影响，“正统思想很浓厚”。尽管国民党政权业已崩溃，可有些学员仍对它存有一丝同情。蒋介石是国民党政权的象征，在一些学员看来，蒋介石在北伐和抗日战争中发挥过作用，是当之无愧的“英雄”。尤其蒋氏代表国民政府“出席开罗会议，世界闻名，妇孺皆知，岂能不称英雄？”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大量弊端，他们也不否认，不过以“明君受蔽”的传统观念解释之，即“蒋介石很好”，只是“手下人太坏”。由于他们欺上凌下，才导致国民党政权腐败不堪<sup>②</sup>。

(3)重专业，轻政治。有学员认为，“我有技术，政治不政治有什么需要学的”<sup>③</sup>，还有些学员认为自己是来学习业务知识的，入校后知道要学习政治，便不高兴起来。个别人甚至情绪激动地表示“不学文化，把介绍信退给我”<sup>④</sup>。

(4)亲美心态。有学员说，“美国统治全世界不也是‘世界大同’？”还说自己“厌恶在中国生存”，即便被送到美国做乞丐也可接受<sup>⑤</sup>。

(5)单纯“雇佣”观。有学员表示“为人民服务，就是为人民币服务”，还有人说，“有奶就是娘，不管他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只要有薪水就行”<sup>⑥</sup>。

(6)“消极跟随”观。有学员说，“现在我不革命，到香港去过快活日子，社会主义实现了再回来过幸福生活。”“社会主义反正是要实现的，现在我何必做事吃苦干革命呢？”<sup>⑦</sup>

(7)“妄图变天”想法。有人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也有人只交出一半的“反动证件”，还有人想到解放区去，等将来蒋介石反攻过来，自己便可做“接收大员”<sup>⑧</sup>。

苏公学员入校时的集体心态为何这般复杂？校方认为，苏南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统治的中心地区”，当地人民“深受反动教育的影响”，所以“对我党缺乏真正的正确认识”。不少学员直至新政权建立后才接触革命，自然“思想认识模糊不清”，历史不清人员更是对革命采取怀疑与畏惧的态度<sup>⑨</sup>。与此同时，有些失学人员“在旧社会操纵投机成习，有浓厚的经济观点，可能存在着国民党在此易发财，共产党来了没饭吃的错误想法”，而失学青年以逃亡地主及苏南集体土改后的地主子女居多。他们“感觉到共产党来了，我照旧未翻身，仍是没有书念”，于是也形成了“谁来也是如此谬论的臆断”<sup>⑩</sup>。

除去校方分析的这些因素外，长期战乱造成的社会彷徨心理也不可忽视。自清廷覆灭以来，

① 苏南公学辅导科：《第一期辅导工作总结》（1949年8月），苏档7015-001-0001，第44~45页。

② 苏南公学教学工作小组：《总结中几个问题的汇报》（1951年6月）、苏南公学财经二队团工委：《总结汇编》（1950年1月），苏档7015-001-0002，第85、15页。

③ 苏南公学财经二队团工委：《总结汇编》（1950年1月），苏档7015-001-0002，第15页。

④ 苏南公学第一部：《工作总结报告》（具体日期不明），苏档7015-002-0045，第3页。

⑤ 苏南公学：《一般思想意识方面》（1950年5月），苏档7015-003-0004，第13页。

⑥ 苏南公学党组：《向区党委、行署补报一九五〇年下半年苏公教育工作的综合简报》（1951年1月），苏档7015-001-0002，第69页。

⑦ 苏南公学：《政治班、一、二、三、八班政治思想教学总结（初稿）》（1952年），苏档7014-001-0047，第27页。

⑧ 苏南公学：《政治班、一、二、三、八班政治思想教学总结（初稿）》（1952年），苏档7014-001-0047，第17、27页。

⑨ 苏南公学校长办公室秘书科：《银行系编写材料提纲》（具体日期不明），苏档7015-003-0030，第49页。

⑩ 苏南公学校长办公室秘书科：《银行系编写材料提纲》（具体日期不明），苏档7015-003-0030，第50页。

中国政权几度更迭，几十年间“乱哄哄，你方战罢我登场”，这使得不少人对新政权能维持多久持观望态度，他们因此决定与新政权保持一段距离。校方注意到，有些学员“既不说国民党好，但也不相信共产党的宣传”，心中实际存在的是“等等看”的想法<sup>①</sup>。一些留用人员更是“脚踩两只船”，只缴出过往证件而留下证章，以备退路。当学校组织他们参加中苏友协时，有人说：“过去参加了个国民党，到现在没弄清，不要再找麻烦”<sup>②</sup>。

### 三、思想更新：工作的目标、方式和效果

考虑到学员入校心态与党的要求存在着较大距离，苏公校方决定从他们入学伊始便展开思想更新工作。根据学校规划，更新工作将达到两个目标，一是在学习阶段，学员需在根除旧思想的基础上建立新观念，也就是“肃清其国民党思想残余”，“初步确立革命人生观”；二是在总结阶段，学员要以新观念检视、坦诚个人历史，并“隔断旧关系”<sup>③</sup>。

首先，进行的是建立新观念的工作。大多数苏公学员在入学前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基本情况缺乏了解，不仅有着“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思想”的留用人员如此<sup>④</sup>，部分新干部对党的理论竟然也一知半解。商业处送来学习的235名调训人员中，85%系渡江战役后参加工作的干部，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又占到总数的52%。可这些被看作“政治质量较好”的学员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知识非常陌生。苏公在他们入学时曾进行过一次摸底考试，结果在回答相当于初中程度的政治常识题时，30%的人员成绩不及格，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是什么，甚至还有人答为婚姻法、土改法与工会法<sup>⑤</sup>。

尽管学员的思想状况令校方不甚满意，但学员普遍钦佩“共产党、解放军有纪律及艰苦朴素的作风”<sup>⑥</sup>，使校方仍有信心在短期内实现学员的观念转换。这是因为，承认中共领导革命从弱到强，直至取得胜利这一事实本身，为思想更新工作的推行提供了有利前提。校方分析后，认为普通学生“政治上比较单纯，富有热情和进取心，比较容易接受真理”；留用人员尽管“有较浓厚的旧作风、旧习气、旧观点，在政治上接受真理较慢”，少数人还“政治成见较深”，可他们总体上有着“正义感”。“进取心”与“正义感”交汇于爱国主义，成为“思想上存在的有利因素”。因此，教员可通过新旧时代对比的方式来激发学员的爱国主义，引导他们头脑中“进步思想”与“落后思想”的斗争，直至最终建立新观念<sup>⑦</sup>。

学习是建立新观念的主要方式。苏公创办之初，校方设计了“时事问题”“新民主主义基本理论”“基本政策”与“革命的人生观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四个专题，依次对首批学员进行教育<sup>⑧</sup>。然而这种教学方式并未取得理想效果。有些学员听过形势报告后，仍沿用国民党的宣传话语，称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还有些学员“历史知识很差”，竟然“对西安事变和九一八都不

① 苏南公学辅导科：《第一期辅导工作总结》（1949年8月），苏档7015-001-0001，第45页。

② 苏南公学：《政治班、一、二、三、八班政治思想教学总结（初稿）》（1952年），苏档7014-001-0047，第28、17页。

③ 苏南公学校长办公室秘书科：《银行系编写材料提纲》（具体日期不明），苏档7015-003-0030，第15页；《苏南公学简要报告》（1953年），苏档7015-001-0004，第32页。

④ 苏南公学：《政治班、一、二、三、八班政治思想教学总结（初稿）》（1952年），苏档7014-001-0047，第18页。

⑤ 苏南公学第一部：《总结报告》（具体日期不明），苏档7015-002-0045，第4页。

⑥ 苏南公学财经二队团工委：《总结汇编》（1950年1月），苏档7015-001-0002，第15页。

⑦ 《苏南公学简要报告》（1952年），苏档7015-001-0004，第32页。

⑧ 苏南公学党委会：《苏南公学七月份综合报告》（1949年8月13日），苏档7015-001-0001，第90页。



太知道是什么一回事”，报告自然也就听得如坠云雾。鉴于本次教学活动“走了弯路”<sup>①</sup>，校方决定停止率先进行时事教育的做法，代之以讲授理论，让学员“从头学起”。

苏公理论课学习时长从三个月至半年不等，约占学员在校学习总课时的1/4，主要内容为“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三十年史及革命人生观”<sup>②</sup>，分为社会发展基本规律与中国革命史两类课程进行讲授。前者侧重理论阐释，主要通过揭发和批判学员中的“消极跟随”的拖混思想和“背道而驰”的变天思想来进行“前途教育”，使他们明确社会发展的方向；后者则强调“以历史换历史”，要求学员在否定“国民党反动廿二年”的基础上，知晓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基本历程与重要理论<sup>③</sup>。

相对讲授抽象的社会发展规律，革命史课程更受到校方的重视。以三个月的集中讲授期为例，前者用时一个月，后者为50天，授课时间近乎前者一倍。具体内容包括（1）从“五四”到“七七”的历史；（2）谁真正领导抗日；（3）谁应对解放战争的爆发负责。革命史课程之所以如此设置，不仅是因为不少学员不了解中共历史，急需弥补这方面的知识空白，更是因为中共非常注重“以历史记忆的构建，强化民族和国家记忆中的革命元素”<sup>④</sup>，通过将本党历史与中国近现代史的连接，彰显自身肩负领导民族振衰起敝的宏大使命以及革命胜利的必然性，而这也是新政权正当性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持。

除了学习中国革命史外，学员还要学习中国革命与苏联的关系。在冷战背景下，中国革命与建政并不孤立存在，而是与社会主义阵营融为一体的。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中心，十月革命的爆发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再加之新政权发出“向苏联学习”的号召，这些都决定了理论课的讲授内容将向外延伸至苏联那里。苏公要求学员认识到苏联是当前世界和平民主的堡垒，树立起中国革命就要向苏联学习的新观念<sup>⑤</sup>。

在课堂教育之余，苏公还注重组织学员在课后通过辩论赛来提升学习效能。如何评价蒋介石一直是学员争论的焦点。苏公多次召开辩论赛，安排学员从正反两个方面展开论述。辩论赛不多讨论蒋介石行事的细节，而更多是界定“英雄”的标准，再以此来推论蒋介石是否符合“英雄”<sup>⑥</sup>。争论的依据则来源于课堂讲授的《新民主主义论》等，因而辩论是课程内容对学员规训的延续，而学员也以亲身操作的方式强化了对课堂传授知识的记忆。

经过精心安排，苏公形成了一个从课堂到课外的认知覆盖体系，有关革命的概念与理论源源不断进驻学员脑海深处，促使他们思想发生转变。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他们的考试成绩出现了大幅提升，如下表。

一部同学入学考试与期终考试成绩对比表

1953年1月29日<sup>⑦</sup>

考 试	5分	4分	3分	1~2分
入学考试	14人	46人	94人	70人
期末考试	129人	75人	20人	0

① 苏南公学辅导科：《第一期辅导工作总结》（1949年8月），苏档7015-001-0001，第44、90、91页。

② 苏南公学：《政治班、一、二、三、八班政治思想教学总结（初稿）》（1952年），苏档7014-001-0047，第18页；中共苏南区党委宣传部：《一九五〇年上半年工作报告》（1950年7月），苏档7006-001-0102，第6页。

③ 苏南公学校长办公室秘书科：《银行系编写材料提纲》（具体日期不明），苏档7015-003-0030，第51页。

④ 黄道炫：《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4期。

⑤ 《第一单元 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十月革命）》（具体日期不明），苏档7015-003-0030，第15页。

⑥ 《关于蒋介石是否是英雄的讨论》（1950年7月18日），《学习周报》第三版，苏档7015-003-0035，第92页。

⑦ 苏南公学中国革命问题教研组：《关于一部教学工作总结》（1953年2月），苏档7015-002-0033，第30页。

随着革命观念的确立，学员对国民党政权也就做出了新评价。不少人认为蒋介石的本质是“投机混入革命阵营”，“篡夺革命胜利果实”<sup>①</sup>。与之同步，他们的美国观也发生了较大转变。有学员自问自答地说道，“马歇尔究竟是什么人”？他是一个“战争贩子”，来华目的就是策动“蒋匪帮发动了反人民的战争”，也有人说自己曾经认为美国是“最可爱的朋友”，现在意识到了“美帝的真面目”是“哄骗欺诈、阴险欺诈”<sup>②</sup>。

一些学员还运用刚刚学会的革命话语与阶级理论进行自我剖析。有人表示，自己如果再不安心工作，“就等于不安心革命”，也有人说自己“过去谈到工人阶级的领导，思想老是搞不通，大老粗怎么能领导我们？”经过学习后，这才知道自己原先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sup>③</sup>。一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学员过去定位是“没有任何政治色彩”的技术工作者，现在意识到自己不仅曾为统治阶级服务过，还在无形中成为“它们的帮凶”<sup>④</sup>。

更新学员思想的目的不止在于促使其转换观念，还在于他们“割断旧关系”，这对于苏南公学学员尤其现实意义。苏公大多数学员1949年以前生活在国民党统治下，自然不可避免地与国民党政权或多或少有过往来。一些留用人员更直接在国民党政权任职，做过“还乡团、伪乡保长”或参加过“反动党团特组织和反动军队”等。是否将这些“反动政治疑点”和盘托出，成为检验每个学员思想更新成果的重要指标。在思想总结的初始阶段，学员们尽管纷纷主动汇报个人情况，可多半是“把历史当做流水账来报销，不分析批判”<sup>⑤</sup>。这种做法或许是他们不明白总结的写作意图，或许是基于避重就轻的考量，故意遮蔽某些个人历史问题，总之与学校的要求相距甚远。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苏公特地制定了总结提纲的统一格式，要求学员必须讲述自己的家庭经济与政治情况、学生生活与社会职业经历等，具体言之：

(1) 自己在旧社会所服务的机关负责人及最密切的同事是谁，他们的政治态度、政治背景怎样？目前的关系怎样？

(2) 何时何地由何人介绍，经过何种手续参加了何种“反动团体会员”？受过何种训练，该组织的内部情况是什么？在该组织内担任过何种职务，进行过哪些活动？是否脱离，有何证明？<sup>⑥</sup>

配合个人思想总结，苏公校刊《学习周报》不断刊载一些留用人员痛下决心、坦诚个人秘密的报道，例如有人主动交出了“反动党团党证、服务证、军政机关证件”<sup>⑦</sup>，再如有人经过激烈思想斗争，说出了自己私藏手枪、电台等军用品的秘密<sup>⑧</sup>。以这些典型事例为示范，《学习周报》呼吁学员要对党“忠诚老实”，鼓励举棋不定的旧人员主动讲述个人历史，表明自己与旧社会一刀两断的决心。

在“放下心理包袱，如实交代自我历史”，便可“重获新生”的氛围下，旧人员众多的一、二、三、八班与政治班出现了不少人主动补充交代的情况，以第六届五个班632名学员为例，有136人补充坦白了过去的历史罪恶，如沈某某坦承自己在还乡团时，抢劫老百姓钱财数次，放火

① 《认真学习中国近三十年历史 详细汇报热烈论争》，《学习周报》，1950年2月2日，第三版，苏档7015-003-0035，第17页。

② 《我看了〈美帝暴行图〉之后》、《丢掉家庭包袱，答谢吴校长的慰问》，《学习周报》，1951年1月21日，第四版，苏档7015-003-0036。

③ 苏南公学第一部：《工作总结报告》（具体日期不明），苏档7015-002-0045，第5页。

④ 《我们在进步中——一个小组的学习收获》，《学习周报》，1951年2月3日，第二版，苏档7015-003-0036，第15页。

⑤ 苏南公学：《政治班、一、二、三、八班政治思想教学总结（初稿）》（1952年），苏档7014-001-0047，第18页。

⑥ 《思想总结提纲》（1950年），苏档7015-002-0023，第23页。

⑦ 《大胆暴露出证件 与旧社会一刀两断》，《学习周报》，1950年4月8日，苏档7015-003-0035，第26页。

⑧ 《学习近三十年史的收获》，《学习周报》（1950年4月23日），第四版，苏档7015-003-0036，第37页。



一次。有165人补充坦白参加党团特等组织。如李某某坦白自己曾参加过七种特务组织,陈某某说自己曾做过国民党特务、汪伪特务和日本特务。有388人补充修正了个人历史。如张某全部推翻了过去“伪造的历史”,而补充修正了新的历史。

对于这些补充交代的个人历史问题,校方结合从多个方面汇总的材料进行分析,认为有377人(占总人数的60%)大体对自我政治历史问题作了交代,本人讲述内容与学校掌握的材料基本一致。145人(占总人数的23%)讲述自己在政治历史方面的主要问题,但还有一部分问题未彻底坦白。即便如此,学校对其情况也已基本清楚。有79人(占总数的12%)基本未交代政治历史问题,而选择讲述次要问题。只有31人(占总人数的5%)的政治历史没有问题<sup>①</sup>。简言之,通过更新思想,学校更为深入地了解学员的个人情况,而学员的种种表现也将作为学校考核的一项重要凭借,与他们的工作分配相关联。

#### 四、学员的工作分配

在三年多的办学时间内,苏南公学共培训13808名学员,其中分配工作的13280人<sup>②</sup>,为苏南及全国其他地区的秩序重组与经济建设提供了数量较为可观的干部资源。

苏公学员的分配工作是由行署人事处参考苏公的鉴定意见实行的。鉴定意见综合考察了个人历史、家庭背景与在校表现三方面因素。三方面均符合要求者,即可获得职位。前二项存有“疑点”的学员,亦可通过入校后的表现加以弥补。第六届一赵姓学员1946年参加中统外围组织,其弟又随国民党军赴台,政治背景不可谓不复杂,但他补充交代了自己参加中统的情况,被认为“表现尚可”,故仍安排工作。也有学员意识到“表现”的重要性,希望通过一番积极举动能抹平自身历史问题,却因表现过度最终未能遂愿。同以第六届学员为例,徐某“解放前一贯是不法商人”,入校后“仍想发财做老板”。为了表现自己态度积极,他“对领导每见必鞠躬九十度”,对同学也是“一团和气”,结果此举被看做“虚伪世故”<sup>③</sup>,对他的工作分配并无多少帮助可言。

作为以培训财经干部为主的干校,苏公学员毕业后大多去苏南各单位的财务系统任职。具体从事哪项财务工作是与个人背景分不开的。这一点在班级建制时即有体现。例如银行系会计、业务、农贷、保险四个班的学员只需具备初中水平即可,货币管理班的学员不仅要有高中水平,还要求“政治上纯洁可靠”<sup>④</sup>。工作分配同样采取了差异化的措施,即根据财务工作的重要性划分序差,最重要的是贷款工作。第五届李姓某学员,入校后“学习认真,工作能负责”,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吸收为团员。苏公将她确立为“培养对象”,认为她能从事贷款工作。另一袁姓学员“爱面子”,也“不联系群众”,学校建议分配其去做储蓄工作<sup>⑤</sup>。

除了苏南本地外,苏公还调派了近2000名学员赴西南、华东、华北等地。此举源于中共中央对苏南的定位。苏南文教事业发达,中央视为之为华东地区除上海、南京之外的经济、文化中心,是“争取全国胜利的基地”<sup>⑥</sup>,故指定苏南区委派遣人员支援其他地区建设。

① 苏南公学:《政治班、一、二、三、八班政治思想教学总结(初稿)》(1952年),苏档7014-001-0047,第24、25页。

② 苏南公学:《附带说明》(1953年),苏档5004-001-0005,第7页。

③ 《苏南公学六届一班学员处理审查表》(1952年10月25日),苏档7015-002-0032,第21、124页。

④ 苏南公学:《银行系学员业务分班条件》(1951年),苏档7015-003-0030,第62页。

⑤ 《苏南公学六届五班调查登记表》、《苏南公学第五届储蓄班学员调查登记表》(1952年5月),苏档7015-002-0037,第14、112页。

⑥ 陈光:《陈部长在第一次直属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上的报告》(1949年6月9日),苏档3070-001-0054,第1页。

西南是苏公外派人员最多的地区。1949年6月，华东局奉中共中央指示，计划从华东地区抽调14000名干部，其中苏南地区需提供1085名干部赴四川、贵州工作<sup>①</sup>，并进一步指示苏南公学要选拔1000余人参加“西南服务团”。经过迅速动员，苏公在短短三天内有1500多名学员报名参加，最终批准1010人随二野进军大西南<sup>②</sup>。这种外派任务随着1950年下半年全国各地干训系统步入正规化后逐渐停止。

对苏公而言，最为复杂的分配事务乃是如何安排留用人员的工作。从阶级论角度而言，这些学员中的不少人在新政权建立前“有血债、有罪恶、有民愤、对革命有直接危害”，对他们“应从严肃处理”。不过为了体现分配政策的宽大灵活，苏公还是对留用人员进行了区分，规定“一般人员如反动政府的低级职员”，“一般的反动党、团员”可尽量录用。

针对留用人员的分配问题，苏公党委专门向苏南区党委、行署党组作了汇报，之后又在行署办公厅指示下，配合行署人事处，将可分配工作的旧人员细分为七类，分别是：（1）历史上没有国民党、三青团问题者和一般党团员、会道门一般人员，除个别意识太恶劣以外，均可分配工作；（2）前政权的一般低级职员和旧军队的一般人员，其政治历史问题已基本审查清楚而表现尚好者；（3）本人历史政治问题已交代清楚，虽社会关系复杂，但与本人关系不大而表现一般较好者；（4）参加特务的外围组织，其问题已坦白清楚而表现一般还好者；（5）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三青团分队长，前政权财经、文教等科长及军队中连排长等，其问题已彻底坦白交代清楚，表现较好，能悔改有工作能力者；（6）一般特务分子（除现行特务外）问题已坦白彻底，能真诚悔改者，即交清组织、交出证件、谈清其活动并表现较好者；（7）技术人员<sup>③</sup>。留用人员一般不会分配回原单位工作。譬如第五届第三班为司法系统留用人员集训班有159名学员，其中参加国民党、三青团及其他“中统”等特务组织101人，有人还是“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经过三个月集训后，苏公认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仍可留用，但不宜回到司法系统而是调配从事新工作，以中小学任教为最多<sup>④</sup>。

苏公虽制定了明确的留用人员分配政策，但政策在执行中很难做到每次都规行矩步地执行。一方面，“一般人员”是一个有着高度弹性的模糊概念，如何解释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办事人员的个人理解。在1950年代初期阶级意识尚未强化的背景下，亲朋故交之类的人际关系仍有某种拓展空间。于是，有些“问题”人员便借助私交改变自己的定性，转换自己的工作分配。一丁姓学员“三度脱离革命，在校打人受处分，水平又低”。通常而言，该员应作退职返乡处理，手续也已办理。只是未想到他通过“找关系”使得个人历史问题都被视而不见，最后还被留到《工人生活报》当上了管理员<sup>⑤</sup>。

另一方面，苏公平平均每届毕业生千余名，将数量如此众多的人员严丝合缝地逐一分配到符合政策要求的岗位是项浩大的人事重组工程，经办人员难免在办理时会出现疏忽。学员钱某某在抗战时期参加过汪伪政权的“和平军”，负责个人历史审核的辅导科工作人员认为这属于普通问题而未再继续调查，考虑到他有会计技术，遂建议分配其去行署卫生处工作。然而之后不久，钱某

① 中共苏南区党委：《区党委关于大量训练、提拔干部、学生、技术人才干部的指示》（1949年6月），苏档7006-001-0008，第30页。

② 苏南公学党委会：《苏南公学七月份综合报告》（1949年8月13日），苏档7015-001-0001，第93页。

③ 苏南公学党委会：《对我校一、二、三、八班及政治班学员的分配情况提出初步的意见》（1952年5月12日），苏档7015-001-0004，第8页。

④ 其中任职于工农速成中学70人、小学19人、扫盲队18人。苏南公学：《第三班旧司法人员集训工作总结报告》（1952年11月6日），苏档7015-001-0004，第20页。

⑤ 苏南公学：《第四期学员结束和退职人员处理工作的报告》（1951年8月），苏档7015-001-0002，第77页。

某被检举曾杀害民兵卅余名,政治定性就从“普通问题”上升为“历史上有罪恶”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应予以“法办”。苏公立即联系行署公安部门进行处理,也为此疏忽向区党委组织部作出了检查<sup>①</sup>。

苏公有528名学员未获得工作分配机会<sup>②</sup>。究其原因,大致有如下几种:(1)“政治品质不好,不具备人民干部的条件”。主要表现为该学员“违反校规被开除”,“思想意识很坏,作风又极端恶劣,一贯表现不好”,或原单位在“三反”过程中,被发现存在着新的经济问题而调回处理<sup>③</sup>。(2)严重个人政治历史问题。包含了“历史上有罪恶、有血债、有民愤者”;“有材料证实系现行特务者”;“有现行特务嫌疑有一定材料之根据者”<sup>④</sup>。(3)本人自动放弃学习。主要为学员因病、年老体弱或死亡未能完成学业,或者开小差、请假未归而主动离校<sup>⑤</sup>。(4)对学员情况“了解不全面”所造成。某学员患有“神经病”,年幼时发过多次,参加工作后尽管复发过一次,但程度不深,入校前还做过会计和保管工作。对于他的身体状况,经办人员全面了解便决定让其回家<sup>⑥</sup>。

对不予分配工作一事,苏公校方态度是慎重的。正副校长吴天石、王韦平在联名给苏南区党委、行署党组报告中,特地建议“最好由人事处打通各机关的思想”,若学员只是“思想意识上的缺点和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仍应尽量录用而少洗刷<sup>⑦</sup>。

对未分配工作的学员,校方也是有所安排的。基于“不致流落街头影响社会治安”的考虑,学校对他们给予经济补助。譬如第四期退职遣散人员157人,可发“生产补助金”有151人,其中薪给制人员91人,发给补助金52883690元(人民币旧币——引者注),供给制人员60人,发给生产补助金12931660元,二者合计发给65815350元,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他们的经济压力<sup>⑧</sup>。

对于毕业后的工作分配,学员们的态度如何?有人进行比较后,认为“人家不如我能工作,我比他好,反退职”,因而有不平衡感。也有人抱怨,“教育改造我数月,还是叫我回家”。还有些人从报纸上看到学员“复员”消息,认为自己将位列其中,于是索性计划日后靠做生意谋生<sup>⑨</sup>。

不过,就从整体而言,情绪不满者只有少数,多数学员是持正面接受的态度。旧司法人员私下议论,“学的是司法,做的是司法,现在不要我们了,怎么办?”想到前途未卜,他们不免忧心忡忡起来。出乎意料的是,到了毕业时,自己还有分配机会,虽然新工作不是自己熟悉的專業,但毕竟有了一份可以维持生计的工作,于是“抱着感激的心情走向工作岗位”。一些“年老和有病的人员”原以为自己无法工作,却没想到还获得了新工作,心情更是异常激动,以至于离校时“再三渴望我们(指教员——引者注)以后多与他们通信,还要我们继续不断帮助他们进步”。因而,苏公认为“一般人员对政府和学校的这种负责和耐心精神是满意的”,用他们的话来说,“只

① 中共苏公总支委员会:《至区党委组织部、纪律委员会、行署直属党委会有关苏公党组织存在缺点的检查》(1952年1月12日),苏档7015-002-0033,第9页。

② 苏南公学:《附带说明》(1953年),苏档5004-001-0005,第7页。

③ 苏南公学:《三年来教学工作概况》(1952年10月18日)、《对我校一、二、三、八班及政治班学员的分配情况提出初步的意见》(1952年5月12日),苏档7015-001-0004,第19、8页;苏南公学:《第四期学员结束和退职人员处理工作的报告》(1951年8月),苏档7015-001-0002,第75页。

④ 苏南公学:《三年来教学工作概况》(1952年10月18日)、《对我校一、二、三、八班及政治班学员的分配情况提出初步的意见》(1952年5月12日),苏档7015-001-0004,第19、8页;

⑤ 苏南公学:《附带说明》(1953年),苏档5004-001-0005,第7页。

⑥ 苏南公学:《第四期学员结束和退职人员处理工作的报告》(1951年8月),苏档7015-001-0002,第77页。

⑦ 苏南公学:《对我校一、二、三、八班及政治班学员的分配情况提出初步的意见》(1952年5月12日),苏档7015-001-0004,第8页。

⑧ 苏南公学:《第四期学员结束和退职人员处理工作的报告》(1951年8月),苏档7015-001-0002,第76页。

⑨ 苏南公学:《第四期学员结束和退职人员处理工作的报告》(1951年8月),苏档7015-001-0002,第77页。



有民主政府才能这样仁至义尽”<sup>①</sup>。

## 结 语

1949年初中国革命胜利在望，随着工作重心从农村移至城市以及管辖地域范围的不断增大，中国共产党迫切需求大量合乎建政要求的基层干部。不过由于胜利进程出乎预料之快，中共尚无充足时间对此问题做好完全准备。面对广袤的新解放区，原有干部不仅数量有限，而且大多数人缺乏城市管理的经验，这种状况无疑会影响到新政权的施政效果。1949年1月底，毛泽东在西柏坡告诉来访的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Anastas Ivanovich Mikoyan），目前中共“急缺在政治上训练有素的干部，以便通过他们控制新的地区”<sup>②</sup>。斯大林在回复毛泽东的电报中建议，中共尽快培养管理工业、金融、农业、铁路管理机构的干部。如果没有这样的学校，就需要尽快建立<sup>③</sup>。

对于如何培训干部，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就有过实践，这就是以“延安公学”为模板的干训样式。随着1949年革命不断胜利，这种干训样式也被陆续推广到了各解放区。从建国前夕至1950年代初，中共干训系统按行政区划级别分为不同层级：大行政区成立的干校命名为“革命大学”，其典型是华北大学、华北革命大学及以它们为主干建立的中国人民大学，省级行政区则普遍成立“公学”，地、市、县则成立规模更小的培训班。

本文以一所省级新解放区的干部培训学校为考察对象，对其运行机制进行了初步梳理，从中可以看到公学在新政权建立之初对于基层干部的生成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首先，公学为接管与恢复经济培训了大批基层干部。公学成立之初所培训的干部多调往下一个即将解放的区域，这使得干部有如“接力棒”般不断前移，从而有利于全国范围内建政工作的展开。全国局面稳定后，公学改以培训财务管理干部为主，为当地的经济恢复提供了一批数量可观的技术管理人才。

其次，开办公学有助于缓解就业压力。长期的战乱导致失学失业现象严重，新政权建立后，必须处理这一群体的就业问题。公学以考试方式将一部分失学、失业人员招入学校学习。与此同时，新政权建立后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形势，需要竭力缩减行政开支。精简人员是压缩开支的重要方式。新政权遂安排部分精简人员入校学习作为缓冲，以免他们在短期内集中涌向社会，加重就业压力。

最后，公学是考核留用人员的重要场所。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政权人员有“包下来”的政策允诺，然而，留用人员毕竟与前政权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对新政权是否认同，认同程度如何，都需要进行细致的辨别。公学将结合他们在校表现与个人背景进行综合考核。

公学学员既然是干部的重要来源，那么他们的思想与新政权宗奉的观念是否一致至关重要。学员刚入学时，其思想观念与新政权的要求存在着相当距离。公学通过系统的政治学习，不仅更新他们原有思想，还进一步了解其历史，并最终结合他们的表现对其毕业后的工作去向予以安排。

对于中共的干校培训系统，苏联在华专家有自己的看法。李滨的研究表明，人民大学的苏联

<sup>①</sup> 苏南公学：《第四期学员结束和退职人员处理工作的报告》（1951年8月），苏档7015-001-0002，第77页。

<sup>②</sup> 《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中共当前的工作方针》（1949年1月31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377、378页。

<sup>③</sup>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关于大城市和提供武器弹药的问题》（1949年2月3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卷，第402页。

专家认为干校学员应该仅从革命者中招收，学校中的旧知识分子与留用人员尤其让他们感到不安<sup>①</sup>。苏联专家这种看法是不切合中国当时实际情况的。新政权建立初始，中共不少干部除了自身文化水平有限的原因外，对新区的情况一时缺乏深入了解，因而新政权若要有序运转，便离不开这些旧知识分子人员与留用人员的参与。另一方面，新政权对于个人政治背景因素也不是完全忽略，置之不理的。在学员的工作去向问题上，人事部门注意结合个人背景因素进行考核。因此，在公学开办的背后映射出中共在确保建政前提下对人员安排的弹性逻辑。也正是通过兼具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组织政策，她才得以迅速培养出大批基层干部，并通过他们去落实执政意图，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走出了“胜利的困境”。

(本文作者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江苏 210093)

[责任编辑：侯竹青]

### 《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3期要目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发展创新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冷兆松 周力航

新中国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研究

韩广富 张新岩

20世纪50年代治淮模范宣传考察

王仓仓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研究

储著武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中国对亚洲政策的提出

张颖 潘敬国

20世纪50年代中国与朝鲜的文化交往

——以《梁祝》《西厢记》与《春香传》的跨国相遇为例

苏菲

1950—1952年重庆防疫网的构建

鲁克亮 李晓朋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接受外资津贴医疗机构改造研究

庞思娇

改革开放初期上海落实私房政策的历史考察

肖存良

农业生产合作社干部研究(1954—1956年)

常明明

<sup>①</sup> 李滨(Douglas A. Stiffler):《创建“新中国第一所新式正规大学”:1949-1950年》,周杰荣(Jeremy Brown)、毕克伟(Paul G. Pickowicz)编:《胜利的困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岁月》,姚昱等译,第309~311页。